

“宁波帮”研究

宁波市统战理论学会

编 者 的 话

宁波，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到来，拉开了大规模建设的序幕：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指示后，更引起国内外瞩目和关注，从而也推动了对“宁波帮”问题的研究。我们有幸承担作为宁波市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之一的《“宁波帮”研究》工作，确感责任重大。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得以完成该课题。如果对今后进一步团结、发动“宁波帮”工作有所助益的话，那将感到莫大欣慰。

本课题由宁波市政协主席徐季子教授任组长，并为《“宁波帮”研究》作了序。统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由陈金水执笔；第二部分由李政、葛国培执笔；第三部分由朱中人执笔；第四部分由陈燕璋执笔；第五部分

由王舜祁执笔；第六部分由任中达、贺秉元执笔。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配合和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本课题由陈金水、任中达、李政三位同志负责编纂。因水平有限，望批评指正。

宁波市统战理论学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言	(1)
一、邓小平同志指示的意义	(5)
二、“宁波帮”形成的历史因素 及其作用	(12)
三、“宁波帮”现状及特点	(24)
四、“宁波帮”与宁波的开发建设 …	(38)
五、“宁波帮”和祖国统一事业……	(45)
六、“宁波帮”的心态探索	(52)

序　　言

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俗称“无宁不成市”，意思是说凡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有宁波人在经营工商业。因为宁波在外地从事工商业的人多，而且经营得法，有较扎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宁波人又比较看重乡情乡谊，宁波人帮宁波人，互相帮衬，相互依托，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宁波工商业者的实力地位。于是外省人将善于经营、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宁波人联在一起，称之为“宁波帮”。“宁波帮”和“山西帮”、“安徽帮”、“潮州帮”、“福建帮”……一样成为我国工商经济发展史上著名的商帮。从19世纪以来，各地的商帮都有起有落，唯有“宁波帮”却历久不衰，而且越到近代“宁波帮”的声誉越隆，尤其在港台等地宁波实业家的经营才能、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是举世闻名的。

宁波人既以善于经商闻名，人们就简单地将宁波人的才干归结为“会做生意”。其实这样来看宁波人的聪明才智是不全面的。宁波实业家的创业和开拓精神来自他们审时度势，观察局势的敏锐；勤于进取，敢冒风险的勇气；克勤克俭，求实务本的干练和见微知著，随机应变的手腕。以上多种素质交融一体，才形成宁波实业家的才智和本领。为之，我们认为宁波人的才能和宁波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

最早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就显示了他们非常的智慧，在古文化遗址中河姆渡遗址属于先进的序列。远在公元前10世纪宁波就是造船和海运基地，《周逸书》记“成王时，于越献舟”。周成王时越地就有船隻输贡。《慎子》记载

“行海坐而至越，有舟故也”，意思是说在海上可以坐着行进到宁波，因为有了船的缘故。据张道渊考证“于越所献之舟”其船“当造于今宁波市”，他还认为：“《慎子》所记，为宁波市航海之最古记录……宁波市实为中国造船与航海之发轫地也。”（文载1933年《国风》三卷9期《宁波市在国际通商史上之地位》）。在唐代，“海外杂国贾舶交至”（宝庆《四明志》）唐代宁波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各国商船都到宁波来贸易。在宋代，《宋史·神宗记》写道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在明州造二艘巨舰，“一曰灵虚致远妥济，次曰灵飞顺济，皆名为神舟”；此外还造有“万斛船”在当时可算是世界最大吨位的海船。在元代，庆元年间宁波是重要的海运外贸港和军港。以上记载都说明宁波海上开发是很早的。

北宋在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试行局部改革，宁波人就比较注意如何来改善自家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南宋时有“心学”大师杨简等人聚集在月湖讲学，他们宣扬的虽是陆象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但他们要求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在读书人中起过较好的作用，现在宁波人中间还流行“做人凭良心”的常用语，这不能说“心学”对此没有一点影响。明代，姚江王守仁（阳明）倡“致良知”学说，他说“知善知恶，是谓良知；为善去恶，是谓格物。”要求人们以反求自身的修养方法来完善自己。同时他还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主张“知行并进”。王阳明思想对讲究实际，善于经营，着重商业信誉的宁波人是有一定影响的。清初，四明大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观点，更直接影响了近代宁波实业家重视工商业的思想。鸦片战争后，宁波为“五口通商”

口岸之一，传统的宁波文化发生了大的变异，带来许多消极因素，但同时也输入了近代科学知识，宁波外出经商的人多了，在国内外一些大商埠中逐步形成了“宁波帮”。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热心办学，培养为商业服务的人才，反映了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要求。宁波实业家捐资在家乡办学是有传统的，这也是近代宁波文化的一个特点。

我们研究“宁波帮”，要以更广泛的范围，更多面的视角，来探索“宁波帮”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的趋势，从而在理论上加深对动员全世界“宁波帮”来建设宁波深远意义的认识。

发动“宁波帮”来建设宁波从广义说，孙中山先生早在1916年已将这问题提出来了。1916年8月孙中山在宁波作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他说“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以地位、人才，均具此项资格。”同时，他在“振兴实业”“讲求水利”“整顿市政”三个方面提出了设想。讲到振兴实业时，他说“宁波地方之实业，非不发达，然其发达多在外埠，鄙见以为发展实业，在内地更为重要。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自茂也。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验，本不浅薄，而甬江有此良港，运输便利，不独可将商品运输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扩充，则母地实业既日臻发达，而甬人之营业于外者，自无不随母地而益形发展”。孙先生是有远见的，这些话，当时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而在今天却是有现实意义的。

邓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总蓝图时，十分关心沿海地区的发展，专门提出“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这是他高度重视世界

各地“宁波帮”的作用，看到宁波具有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条件，才发出这个号召的。现在宁波市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正在为实践这一号召而努力，在海外的宁波籍人士也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因此对“宁波帮”作一专门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眼前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对这一课题作一粗浅的探讨，关于“宁波帮”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及“宁波帮”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问题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对“宁波帮”真正能作出有价值的研究，则有赖于关心于此的海内外学者、专家来共襄其成，我们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徐季子

1989年1月

邓小平同志指示的意义

1984年4月，宁波这个历史悠久、经济和文化素称发达的沿海城市，被国务院正式确定为我国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从此，这个在我国近代史上曾一度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港口城市，又一次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开始新的国际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个城市能重新发挥她应有的影响和才华，更好地汲取当今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宁波作出贡献；也期望她能依靠那些留居在海外的家乡赤子来帮助家乡建设。然而，现实和愿望毕竟是有距离的。在对外开放中，宁波虽然有许多有利条件：有北仑深水良港；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宁波帮”；有相当的工业基础、经济实力和科技力量。但是，这些条件有的尚待开发，有的尚待利用，有的还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而所有这些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财力和人才这两大问题上。除依靠中央和地方的力量解决外，海外“宁波帮”应该是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是建设宁波潜在的财力库和人才库。谁去开启海外“宁波帮”这扇心扉？融解、弥合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冷却了的海外赤子对家乡建设的心灵，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奉献他们的力量呢？

邓小平同志直接过问宁波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强调要重视长于经营，在世界上已有影响的宁波籍华侨的作用。于1984年8月作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重要指示。这一指示指明了宁波前进的方向，鼓舞

着宁波人民对开发建设宁波的巨大信心。经过4年多的实践，宁波在发动“宁波帮”造福桑梓、建设家乡中，做了一些工作，对加快宁波市的改革、开放和建设的步伐，促进祖国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是极其正确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党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灵活运用和具体充实。

一、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广泛性。

新时期统一战线为什么由过去的“革命的”改称为“爱国的”统一战线，其根本原因是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统一战线的内部结构也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统一战线已由过去的“阶级联盟”转变为“政治联盟”，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政 治联盟。它包含两个新的联盟，一个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这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联盟；另一个是同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包括港澳、台湾和国外侨胞中赞成祖国统一者的联盟，这是爱国主义的联盟。为了广泛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为了有利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央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的统一战线”，以便在爱国的旗帜下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和各方面人士，把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都联合起来。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他用了“全世

界”、“宁波帮”和“都”三个词来体现他对广泛性的要求。一是从范围上讲，要把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在内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二是从阶层上讲，要把“宁波帮”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不同政治信仰的人，包括台湾上层人士和大实业家都动员起来；三是从程度上讲，不是一般动员，一部分动员，而是要“都”动员。这就具体形象地运用了党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和掌握这一思想。

二、充分体现了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总目标。

随着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基本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新时期的统战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出现了新的格局。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党中央及时确定了海外统战工作的总目标：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并明确指出统战工作应当开阔眼界，走向世界，广交朋友，联络友谊，要走出去，请进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做好几千万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

小平同志的指示，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因为宁波既是浙江的侨乡，也是蒋经国和俞国华等台湾上层人士的家乡。小平同志讲的“宁波帮”包括这些上层人士在内的广大台湾同胞。如果通过各方面的工作把这些因素调动起来，那将是对祖国统一的一大贡献。另外在广大侨胞、港澳同胞和外籍华人中有诸如包玉刚、邵逸夫、应行久、陈廷骅、翁心梓、叶惟洪、於梨华等实业家、专家和学者，如果把这部分力量都动员起来，建设家乡，这将对宁波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对振兴中华也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小平同志的指示也为海外统战工作指明了具体的方向。

三、这一指示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统一战线所作的著名论断一样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名言在当时不同工人政党和政治派别诸多纷争的情况下，是融合政党内部团结，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武器和法宝，就是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列宁在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把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由于民族利益的一致性，可以促成不同阶级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毛泽东正是把这一思想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作为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呢？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建立统一战线，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是建立在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小平同志对新时期的统战工作作了一系列的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是对宁波一地而言，但也蕴藏着更深刻、范围更大的含义，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动员起来建设中华，那将是一支极为可观的依靠力量，必将对我国的四化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小平同志这一指示将成为我们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指针。

和方向。

其次，从现实意义上分析，小平同志这一指示是团结“宁波帮”的法宝。

一、它充分肯定了“宁波帮”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宁波帮”的爱国爱乡热情。

追溯“宁波帮”形成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出，“宁波帮”在我国近代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1)“宁波帮”最初是一个商帮，它是在我国封建主义社会趋向没落、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兴起之时适应于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商帮会，对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2)“宁波帮”在海外素有勤劳、善于经营的美称。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已积累雄厚的实力，在某些居住国或地区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建设宁波的一个潜在的财力库和智力库。

(3)“宁波帮”素有热爱家乡，造福桑梓的优良传统，他们为家乡的繁荣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

但是在“文革”期间，“宁波帮”的历史被歪曲，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被抹煞，“宁波帮”成了“阶级敌人”的代名词，他们在国外亲属也遭到迫害。这种“左”的错误在海外“宁波帮”心中烙下不良的印象，有的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宁波人，不愿回家乡探望。

小平同志的指示不仅给“宁波帮”正了名，恢复了名誉，而且把它作为建设宁波的一支重要力量看待。这对广大海外“宁波帮”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小平同志还亲自接见包玉刚等海外“宁波帮”中的著名人士，当地政府又及时地

落实了海外同胞有关政策，使他们感到家乡没有忘记游子，家乡人民在欢迎着他们。因此，他们那颗曾经一度冷却了的心逐渐变热了，隔阂在消除，裂缝在弥合，日益增添怀念家乡的情思，并陆续回到故乡探亲访祖。其中有许多著名人士还是解放后第一次返乡。如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包玉刚、影视界巨头邵逸夫、香港南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廷骅、美国第一个华人副市长吴仙标、永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乐声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达三、益电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邵炎忠、东方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浩清、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会长水铭章等。他们回到家乡，被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所感动，纷纷为家乡作出贡献。这些充分说明，小平同志指示的巨大向心力。

二、提高了宁波这个城市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极大地吸引了海内外宁波籍人士到家乡来投资和帮助建设。

宁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曾在我国对外贸易和航运史上留下不朽的篇章。但随着岁月的变迁，她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淡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国务院把宁波列为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以后，开始焕发了青春，重新步入国际国内的经济交往行列。在小平同志作出这一重要指示后，更使宁波作为一位“明星”被推上舞台，引起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1) 这一指示体现了中央对宁波建设的重视。因为宁波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有两大优势，除了上面所述的“宁波帮”这一优势外，宁波港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优势。宁波港，由北仑、镇海、宁波三港区组成，现已建成500吨以上泊位41个，年货物吞吐量已达1800万吨。特别是北仑港，具有水深、流顺、风浪小，不冻、不淤、陆域大

等优点，港区深水岸线长达13公里，可建造万吨到20万吨级的大型深水泊位30多个。如果与舟山深水海域连成一线，可停泊20万吨级巨轮一千多条；可建造10万吨级泊位100多个，吞吐量可超过3亿吨，到那时将成为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孙中山先生预言的“东方大港”也将真正在宁波实现。

(2)这一指示也推动了中央各部门对宁波的支持，给宁波对外开放创造了极为良好的环境。自指示发表之后，赵紫阳、李鹏、万里、谷牧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同志都先后视察过宁波。万里同志还到宁波开了两次国务院办公会议，专门研究宁波的开发建设问题，要把宁波建成为华东地区重要工业基地和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浙江的经济中心。同时，在具体工作上为宁波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

(3)宁波的发展前景对海外“宁波帮”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除慷慨解囊，在他们祖祖辈辈栖居的故乡土地上办公益事业、造福桑梓外，还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投资办厂上来。有的签订了意向书，有的在牵线搭桥，当然，也有的还在“投石问路”。不仅旅居在港澳、国外的同胞关心，甚至连首次回大陆探亲的台湾同胞，也对在宁波投资做生意很感兴趣，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好势头。

三、指明了宁波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和基本途径，有利于调动全市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关心、支持、团结“宁波帮”的工作，同时也推动了统战理论的研究。

在小平同志“指示”的鼓励下，我市已开始出现大家关心和开展团结“宁波帮”工作的新局面。不论是统战、侨务、对台、宗教和外事部门，还是文教、科技和经济部门；不论是市区，还是乡镇；不论是市委、市府领导，还是基层

干部，大家都以不同方式和渠道，开展着此项工作，成为团结“宁波帮”的一支“千军万马”。有了国内这支“千军万马”的支持，我们相信海外“宁波帮”这支“千军万马”也一定可以发动起来。与此同时，小平同志的“指示”也引起了人们对“宁波帮”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动了我市统战理论队伍的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总之，小平同志关于团结“宁波帮”的指示，是我们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团结“宁波帮”的一大法宝，不仅有利于宁波的开发建设，而且对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一总目标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宁波帮”形成的历史因素 及 其 作 用

“宁波帮”是历史的产物，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初露头角的，是宁波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体称谓。这个称谓，是竞争对手赐加的，而不是宁波人自己命名的。因为宁波人没有把自己称为“宁波帮”从而造成竞争对手侧目甚至歧视、排异的必要。为便于论证，对“宁波帮”的概念作如下表述：“宁波帮”是由宁波人汇聚的、具有共同乡音乡情的、以商事活动为主体的、并以相互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地域性群体。也就是说，“宁波帮”的起始是一个商帮，它与“山西帮”“安徽帮”“广东帮”“福建帮”“泉州帮”一样，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有的商帮发展了，有的商帮则衰

落甚至销声匿迹了。例如著名的“徽帮”和“泉州帮”，在历史上曾经称雄一时，垄断着我国东南沿海贸易达四、五百年之久，到了19世纪末期，却已失去其昔日的雄风。而“宁波帮”则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政治、社会诸因素，在时代变迁中风云际会，得以存在并发展。这里就“宁波帮”形成的历史因素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一探讨。

一、“宁波帮”形成的历史因素

名闻遐迩的“宁波帮”，发祥于我国杭州湾南岸东西约200里的广袤的平原、山地和海岛。这是他们的祖先长期栖居赖以生存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何以能在后来孕育起为世人瞩目的“宁波帮”呢？这不是偶然的，是有诸多的主观因素和条件的。

首先，在明朝末年，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以交换为主的手工业、种植业、饲养业和运输业逐步发展。然而，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和“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约束下，这种转化十分缓慢。尤其在明末清初实行长期的海禁，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不到较快的发展。后来清政府虽然放宽海禁，但仍然奉行着有限的开放政策，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仅影响我国的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也影响我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直到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才大梦初醒，方知“天外有天”，打破了中国“唯我独尊”的迷梦。于是，“向西方学习”，成了一时的风尚。与此同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民